

思想文化批判

DANGDAI ZHONGGUO SIXIANG WENHUA PIPAN

当代中国

刘东超 著

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流派和人物纷繁复杂，主流和支流相反相成，热点和新见层叠出现，进展和成就斐然可观。对于其中的正确和错误、深刻和浅薄、偏颇和纯正、狭窄和阔大做出观察和评判是学术界的时代使命，本书是作者自觉承担这一使命的一家之言。

河北大学 出版社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当代中国 思想文化批判

刘东超 著

河北大学 出版社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分会 200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刘东超 著.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1097-205-5

I. 当… II. 刘… III. ①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②文化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B27-53 K27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5197号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



责任编辑/杨金花 何 东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规格: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7.7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81097-205-5/G · 587

定价: 20.00元

电话: (0312)5921805

email: yangjinhua1970@yahoo.com.cn

hedong1123@126.com

目 录	
哲思编	(1)
当李泽厚成为研究对象.....	(3)
仁心说 学心听 公心辩.....	(6)
诊断时代之症,寻觅思想之方	(11)
全面、细致、平实、公允的解读	(15)
语言流畅、内容丰美的“第二部”	(20)
寻求孔子思想的本真面貌	(25)
感受经典	(28)
感受大德	(31)
如何重塑神圣	(34)
八十年代:甘阳眼中的儒学	(39)
哲学的历史与历史的哲学	(45)
薛泽通《论语智慧》序	(54)
体验不能死的死亡	(58)
文思编	(61)
王朔是时代的一个寓言	(63)
王朔与流氓文化	(66)
点评王朔的点评	(71)
王朔、冯小刚合论	(79)
从“痞子之真”到“大众之浅”	(86)
语言的光芒和思想的偏颇	(95)
一个时代的灵魂记忆	(100)
精彩与失算	(103)
当代中国欲望的文学例证	(108)

史思编	(113)
中国文化的总结和开拓	(115)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	(124)
试谈认识中国历史的范式	(132)
先秦学术研究:文献和义理的双重进路	(140)
华人精神世界的历史性缺失	(148)
学术热情和思想运动	(151)
简论陈撄宁先生的“三教”观	(155)
泰州之学何以形成	(164)
综思编	(169)
当代中国如何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	(171)
如何评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成就	(175)
文化相对主义的误区	(180)
和谐思想:从古至今	(183)
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小议	(191)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机制小议	(195)
反思传统 开拓未来	(199)
杂思编	(203)
九七年“名人”杂议	(205)
吁求公正	(210)
略论杨帆式荒唐	(212)
学者的真实情怀	(215)
大醇小疵	(219)
着眼于人类的普同价值	(223)
佛教定学的系统梳理与现代阐释	(226)
重申问题与反思方法	(232)
近日学事与心事	(235)
怀念恩师赵吉惠先生	(242)

哲思编

ZHESIBIAN



当李泽厚成为研究对象……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学术界的一面旗帜,李泽厚先生在新世纪的姿态和命运颇有值得分析甚至玩味之处。这既和他本人在新世纪的表现(比如他在《浮生论学》中表现出的某些情绪和人格特点,再如他在国内一些思想争论中的发言和表态)有关,也和他作为一种象征透露出的思想潮流的异动流变有关。这两者展示出的一个表面现象则是他越来越多地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让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泽厚少年成名时就有对他的批评和与他的商榷,到八十年代各种批评和商榷就更为广泛,篇幅更长、角度更多。但是,这些批评和商榷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学术讨论或思想批判,而一般不是把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处理。这两者虽然有较大的重合面,但其区别也相当关键。打个比喻说,前者还是将对方看作能及时做出反应的“大活人”来对待,后者则将对方看作不会或不管他会不会做出反应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在新世纪之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也有),李先生似乎渐渐成为别人研究的客观对象,似乎渐渐成为思想史中的人物了。

就笔者视野所及,这样处理李泽厚先生的文献相当不少,而我相当感兴趣且值得讨论的最近有两种,一是易中天先生的《盘点李泽厚》一文,一是何晓明先生的《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一书中对李泽厚的考察。前者以清晰流畅的文笔准确传神地描写出李泽厚今昔的“面貌”(这一“面貌”决定于其客观模样和观察眼光两种因素的“凑合”),后者则将李泽厚放到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来把握。前者的讨论我们主要放到他处探

讨,后者的讨论我们在此一议。

何先生这本书本是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当写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时他考察了李泽厚的思想。很清楚,这里作者并不是和李泽厚商榷什么问题,而是把他作为思想史中的被研究对象来考察。对于这个思想史中最为晚近的人物,作者考察了他的“儒学四期”说、“转化性创造”说、“西体中用”说和“告别革命”论,并将他归结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该书第316页)。应该说,对于李泽厚的这种把握是有其独到思路和特色的,虽然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在此,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当李泽厚成为思想史中的研究对象时意味着什么?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在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维度上,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启和展开它自己的历程。可以说,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的激情昂扬、单薄朴实和九十年代的沉潜积累、冷静务实之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广泛吸取、积极参与、努力创造、稳健推进。在思想水准上,这个时代无疑较大地超越了以前的两个十年。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的思想深刻地打着八十年代的特征,而他的知识积累也是由五六十年代形成并于八十年代展示出来的,应该说在客观尺度上测量,较之新世纪的最高水准是有差距的。据有的师长相告,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青年学者跃跃欲试地以“超越李泽厚”自期自励。而今天,这一梦想实现了,虽然其主体未必是当年的自期者。这样,无论在思想特征上还是在思想水准上李泽厚都只能是“昨日黄花”了。也可以说,李泽厚已经被思想史的步伐迈过,他不成为学术研究对象还能成为什么?

二、在个人命运的角度上,这意味着李泽厚的历史使命

已经基本完结,他本人也只好被滚滚向前的社会大潮推向边缘了。对此,李先生早在几年以前就有感觉了,他自己就有当年轻人根本不知他是何许人之叹。在引起何新先生讥讽的那本《浮生论学》中李先生表现出的落寞感也是明证。易中天《盘点李泽厚》中所说的年轻大学生将李泽厚误看作李泽楷的笑谈也更能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生的必然,李先生用不着伤心和失落,他应该做的倒应是平淡坦然地观看思想舞台上的新近演出。而他的理性精神、辩证方法、审美感悟、历史意识将会作为思想史的财富为新一代思想者所吸取,因为这是宏大纯正的中华精神的当代体现。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对《返本与开新》的评价上。首先我有一点不太同意书中的一个关键性意见,那就是对于李泽厚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定位。在我看来,李泽厚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中当然包含着某些文化保守主义的因素,从他自称为“新儒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些因素尚未在其思想中成为主导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仍然是他思想中的主导精神和根基。而这可以从他对于“创造性的转化”和“转化性的创造”的区分以及对于“吃饭哲学”和“西体中用”的坚持看出来。因此,如果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来定义是否保守的话,我宁愿将李泽厚看作中派人物。不过,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作者以清晰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梳理了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多个层面、诸多人物和大量思想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有分量的思想史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多视角解读的学术文本。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上出现了以儒学复兴为目的的思潮和一批以此为已任的学者。由于某些现实条件的限制,上个世纪他们表达自己思想主张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进入新世纪之后,这种机会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他们在网络中得到全面真实的展现:他们公开“祭出”自己的兴儒旗帜并多方建立自己的言论阵地,他们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展开对内对外的多种争论,他们认真制订自己的计划并积极组织和实施一些活动。可以说,通过网络这一思潮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进程和现实进程。从几个有代表性的网站来看,这一思潮表现出以下特征:一、从对于儒学的态度来说,他们回归传统儒学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可以大致分为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两种思想倾向。二、与对待儒学的态度相关联,这一思潮的人员构成也分为不同派别,他们之间也有较为激烈的相互批评。三、他们对于中国现实(也涉及到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有较大差异,但持批评态度则是共同特征。不过,批评的程度大小不一,其中也有注重建设性的态度。四、从他们的思想功力和学术成就来看,基本上处于奠定基础、建构框架阶段,多数尚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这四项特征导致这一思潮的理论方向和表现形式多分歧、多色彩、不稳定、不成熟。

对于这一思潮,由于各种原因前几年学界关注或公开谈论得较少,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批评和商榷的声音。同这一思潮的展现主要借助网络一样,批评的文章也大多在网络中发表,一些争议也在网络中展开。不过,最近有两部对此进行批评的文集公开出版,并引起各方的一些关注。一本是杨天行先生编的《对“儒学复兴”的质疑》,另一本是张世保先生编

的《大陆新儒学评论》。前者选取了从伦理、政治、文化等角度对于“儒学复兴”思潮进行质疑的十余篇文章,其中包含着对于近十余年来当代大陆新儒学的批评,但也涉及到了对于整个二十世纪儒学的探讨;后者收入的文章则对近年来“政治儒学”、“重建儒教”、“儒化中国”等复兴儒学的说法进行了评论,同时也收入了一些方法论、文化论方面反思的文章。二书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评论的对象有时间跨度上和地域上的差别。前者涉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两岸三地新儒学思潮,后者则着眼于近十五年的大陆儒学复兴思潮。另外,还有必要交待一句的是编者的各自特点:杨天行先生是一位曾经扛过枪打过仗的、年过古稀的离休老干部,且这本书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离休费自费出版;张世保先生则是一个三十多一点的年轻人,这本书的出版是他承担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非常感谢和荣幸的是,这两本文集分别收入了我的几篇文章,虽然此前我和两位编者并没有任何交往。在断断续续几年中写成的这几篇文章中,我的着眼点在于对当代儒学复兴思潮中一些偏颇的思想倾向和错误的论证方法进行批评,而这些批评在网上也曾受到一些反批评。在此,我愿不避“吹牛”嫌疑地将自己写这些文章和进行讨论时的态度表达为“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在阅读这两部文集中其他文章时,我能感觉到绝大多数作者(由于了解有限,我不敢把话说得过分)和编者也在秉持这样的态度。故在此愿做申说。

所谓“仁心说”,指的是以广大仁爱之心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的理论的目的指向的是家国命运、百姓福祉。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历史上有许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现象,“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例子仅在当代就有过不少。因此,意识形态方向的选择和方案的设计的确是

一项复杂、敏感、牵涉面广的工作，而其对错偏正的确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民族国家的命运。也正因如此，我们本着对于民族、国家、百姓负责和热爱的态度来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在这一争论中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当代国际国内局势面前，我国保持意识形态建设的稳健性和连续性是必要的。因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变迁对于民族前程和百姓生活是个不可预料的巨大变数，无人能保障其导致的是良好的结果和积极的方向。像一些儒学复兴者所说的将儒学定为国教之类说法就是这样的变迁。我们对此变迁的方向、意义和时机持怀疑态度。

所谓“学心听”，指的是以学习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批评的对象和批评我们的人。人无完人，理无尽理，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观点都应该保持谦逊的姿态，对于论争中的他人都应该保持尊敬的态度。这是当代学术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我尽力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并经常反思，尽力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并注意从中汲取有益的内容和要素。而且，我十分钦敬自己的批评对象和批评者。在此，我愿意举出自己对之充满敬意的一个批评对象的例子——康晓光先生。他受到我在内的许多人钦敬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李思怡事件中的表现。当一个无辜的年仅三岁的生命被一些渎职者和心灵麻木者夺去后，他拍案而起，自费调查这一事件并写成《起诉》的报告，在无法完整出版的情况下自费印刷赠阅。虽然我至今不同意他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认为自己对他的学术批评可以成立。但仅有这一件事就让我极为尊敬他的人格，并因他的存在使我不敢小看儒学复兴思潮。也正因此，我愿意以学习的心态来对待具有这样人格的思想者，同时也愿意向这样的思想者真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

所谓“公心辩”，指的是公正、公平地对待自己赞成或不赞成的观点，在逻辑面前、事实面前、争论过程中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似乎是当代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念，但在具体的争论过程中却并非人人如此。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围绕新儒学的网络争论中各种“私心”、“偏心”甚至“邪心”大量存在，其表现有拉帮结派、罗织罪名、人身攻击、“诛心之论”、因人废言、因言废人、“歪门邪道”等。前两年关于“子为父隐”等儒家伦理的讨论中有这样的现象，最近关于李零《丧家狗》一书的讨论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我自己贴在网上的文章也曾被人以黑客手段删除过，这显然不是公正、平等的学术争论方式。坦率地说，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许多网站上已经较难进行公平、公正的学术和思想讨论了。不过，我要求自己仍然保持公正、平等的争论态度：既承认自己批评对象的可取之处，也指出其不足之处；既肯定自己批评的理论有可开拓之处，也指出其应摒弃之点；既自信自己所言的正大谨严，也保持反思之心、戒惕之意。我相信，这两部文集的作者和编者都会原则同意此处的表达，而从收入这两部文集的文章来看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战国大儒荀子说过“贵公正而贱鄙争”的话，这是我们在今天批评所谓新儒学的过程中愿意遵守的论辩规范。

在《对“儒学复兴”的质疑》“编者的话”中，杨天行先生说：“为了能对儒学讨论有所认识，近廿年来我重新阅读了儒学的一些典籍，并留心关于儒学研究的一些论述。我是离休干部并非专业儒学研究者。在此以一个民间人士的身份选编这个专集，表明我的关切以及感慨和忧虑。”这部文集的宗旨“在于提倡不同见解的讨论和争鸣，特别是勇于向名家、多数挑战的精神。”在《大陆新儒学评论》的“编后记”中，张世保先生明确把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话引出，

同时把这三句话标在此文集的封面上。从中可以看出,杨、张二位编者的思考和编选工作应该是遵循“仁心”、“学心”、“公心”进行的,也正因如此,收入的这些文章也体现出“三心”原则,虽然各位作者对于仁心、学心、公心的理解可能有些差异。我们希望从事儒学复兴事业的论者也能持守先儒确立的争辩原则,共同展开有意义、有进展的学术争鸣,从而促进我国意识形态的研究和规划工作,为当代思潮的良性互动做出贡献。

诊断时代之症,寻觅思想之方

对自己时代的精神症候作出诊断是思想者的必要工作和应尽责任。黑格尔就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这一责任,他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这是黑格尔对十九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社会的精神症候做出的简明诊断。每当读到此处,我都产生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在表现着相同甚至更为明显、强烈的东西——对于利益和琐屑的过度重视和对于高尚精神生活的过分忽视。可是,今日中国毕竟远远不同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这种相似仅是一个小的方面,那么,如何才能全面系统地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当然也深刻受制于当代人类整体的精神症候)作出诊断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工程,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完成。这里,我想借助王光明、胡越二位先生主编的《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一书提供的某些思想材料对此测窥一斑。

此书是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术论坛”的讲演汇集。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开拓学生的思想视野,该论坛邀请了文学、历史、法律、教育、艺术、语言等学科领域较为著名的一些学者来为学生做报告。严格说来,这些报告记录稿本没有系统的学理一贯性,但由于这些讲演者大都具有较好的学术敏感和较深的社会认知,所以其讲演正好从多侧面多角度

表征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陆离斑驳、五彩缤纷,为我们提供了较好地理解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症候的文本对象。

感知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症状有许多途径和方式,金元浦先生通过我们这个时代对“美丽”的消费揭示出时代的精神困境和人本身的变迁。他在讲演中指出:“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美的消费更是不平衡的。这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惑。一方面是悦目的盛宴,辉煌、奢华,极度侈靡,一些人去参加俱乐部的美容,学习瑜珈,一掷千金乃至万金。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多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还有多少人根本无法谈及所谓的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贫困群体几乎与‘美丽’无缘。我相信在陈家山煤矿下面历经矿难的矿工们现在不会谈什么‘美丽’;那么多打工族漂流族,他们对城市和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可能根本上就没有获得美的自主和美的权力。所以,美的权力是不平衡的,因为美的消费是不平等的。”(该书第360页)在此,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直观的矛盾:一方面存在“景象”的繁荣和“美丽”的盛宴,另一方面却是贫乏者对此的无力享用。应该说,他表达的前一方面的确深刻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乎狂欢式的、无休止的过度“景象”生产、消费和浪费。他表达的后一方面则揭示出对此繁华“景象”的享受不公——富有者的疯狂自悦和贫穷者的无暇一顾。这二者的确构成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悖论之一。但是,历史地看,这一悖论仅是偶然矛盾而非必然冲突,仅是表面矛盾而非深层冲突。也就是说,“景象”的繁盛并不必然意味着享受的不公,前者是一个人类文明前进必然导致的结果,后者则是这个时段社会体制不完善(从某种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二者在